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，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。

 ——习近平

妈妈身边的“国共两党”

N陈俊(福州·梅峰路)

父亲16岁，在福州开了洋衣店

1901年，父亲出生在闽侯陈厝乡，我爷爷是地道的农民，略识诗书，给他起名陈鸿钦。

那时的陈家有几亩农田。爷爷育有四子，我父亲是老三。爷爷栉风沐雨、日夜辛劳，让四个儿子都上了几年私塾，平日也不让他们插手农活，只要求他们农忙时，给家里帮些忙。

四兄弟长大，便相继提出要“闯福州”，第一个提议的是大伯，那时我父亲12岁，也要跟去。爷爷答应了。

父亲后来告诉我，临走前，爷爷交代他两点：一是做人讲信用，无论做什么都要认认真真；二是，并非人人都讲诚信，要有提防之心。

经福州亲戚介绍，父亲去了一家洋衣店（西装店）当学徒，他干活认真、为人诚实，老板很喜欢他，没到三年，就提前教他手艺。这样，父亲十六岁时，就得以另立门户，在福州开了一家小小的洋衣店。

父亲的小店生意红火，并且也开始收学徒，他只收陈厝乡的踏实农家子弟。以后，二伯与四叔也到福州，二伯开了一家小书店，而四叔则在我父亲店里帮忙。

从台湾回福州

父亲买下了龙山巷8号

1925年，父亲回乡成亲。母亲是方庄人，方庄离陈厝不远。婚后，父亲将母亲带来福州。那时，有不少人下南洋或去台湾，四兄弟商量后，决定去台湾发展。1926年，大伯、四叔与我父亲一起去了台北。父亲在台湾，依旧开西装店，四叔在店里帮忙，父亲帮他娶了房妻子，是台湾女子。

父亲在1943年回到福州。叔叔与婶婶也一起回乡。

他说，离开台湾，是因为受不了日本鬼子的欺压，而且非常想念故乡，就带着妻子儿女回到福州。所以，虽然我的兄姐们都在台湾出生，而我却是福州生福州长的福州人。

我记得念小学时，语文课本上有篇课文，说日本鬼子大骂“八格牙路”，我当时小啊，觉得好玩，在家里也“八格牙路”、“八格牙路”地喊，父亲冲过来，狠摔我一巴掌，还声色俱厉地骂我。

后来他看到课文，才心平气和向我解释：“以前在台湾时，常听日本人这样骂人，一天一个日本兵带几个痞子到我们店里砸店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‘八格牙路’，所以直到现在，一听这话就火冒三丈。”

父亲回到福州后，花了八十大洋，买下龙山巷8号这座大宅子，安置一家老小。并且，先后在福州开了三家西装店。

1945年，日本投降。消息传到福州，福州城沸腾了。父亲特别高兴，他指挥伙计们在鼓楼下、南街面及肃威路三家店面张灯结彩，亲自燃放起一串串鞭炮，甚至将南街那家店更名为“胜利西装店”。

父亲历来严格要求子女专心念书，不许到处闲逛。但抗战胜利大放假的三天，父亲第一次允许我哥我姐天天到南街店里，让他们观看欢庆的游行队伍。

18岁的大哥孤身赴台

后来的事，是二哥的回忆。他说，1945年年底的一天，父亲在饭桌上说：“现在台湾也光复了，不知托大伯代管的那家店怎么样了？春节有空，我们照张全家福，依水（我大哥）替我写封信，问问情况，连同全家福一起寄去。”

1946年正月初一，我们在老家龙山巷八号的大厅前照了张全家福。这年夏季，大伯来信了，说日本人走了，生意好了，他很忙，已写信叫依刚（我堂哥）到台湾帮忙。大伯说，我父亲在台湾的那家店，他已没精力代管，要我父亲速到台湾，或卖或租，自己处理。

父亲为难了。那两年，福州西装店生意清淡，正考虑转行，有很多事要处理，实在分不开身。他想让我大哥依水跟依刚一起去台湾，又考虑依水即将高中毕业，正要考大学，去台湾打理生意定会影响学业。

我大哥见父亲忧心得寝食难安，就说：“让我去吧，上大学迟一两年不要紧，你打理好这边的事情，就去台湾接我。”父亲叹口气说：“也只能这样了，只是委屈了你。”

大哥（陈士龙）去台湾后，开始还寄回几封信，以后战事一起，便音信全无。

二姐偷偷参加了解放军

 1949年，我已经三岁多，开始记事啦。那时的福州，给我留下极美好的记忆：阳光无比灿烂的初秋时节，天空蓝晶晶的、亮堂堂的，人人脸上挂着笑容，脚步轻快，年轻人嘴里常哼着歌曲：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……”街上好热闹、好热闹，我在家里也能听见鼓楼方向传来的铿锵的锣鼓声——咚咚锵，咚咚锵！更让人激动的是，解放军要驻扎到龙山巷来啦！

那时，家家户户都积极争取让解放军住自己家。我家隔壁9号、10号，对面的33到35号都住有解放军，而我最遗憾的是，解放军只借用我家一间小空房安放办公用品。偶尔来个干部模样的人，我就好奇地看着他，他总是和蔼地微笑着。

于是，我只能和几个小屁孩经常结伴去邻家串门，解放军都只住在大厅上，地铺上的薄棉被折得四四方方，摆得整整齐齐。解放军中有个小号兵，大约只有十六七岁，红扑扑的圆脸上总挂着灿烂的笑容。他很喜欢小孩，爱跟我们开玩笑。大约住了十几天，解放军就要走了，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不约而同地站在家门口，欢送解放军。解放军集合完毕，有几户人家放起了鞭炮，在众人恋恋不舍的目光中，解放军迈着整齐的步伐，离开龙山巷。

这一年8月底，我家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儿。那天早上，我正在后天井玩，二姐边关房门边对我说：“依俊，爸回来时你对他说，我到同学家去了。”

二姐这一走，一整天没回家。父亲急了，到处找。几天后才知道，二姐参军去了，而且队伍已到福清了。爸也真有能耐，追到福清找二姐。几天后，爸一个人乐呵呵地回来了，说：“淑英（我二姐）在部队上很好，她现在当卫生员，首长说她文化高，打算派她去培训，以后当军医。首长很客气，叫我‘大爷’呢。”父亲不知道，北方人称呼年岁大的人，都叫“大爷”。

又过几天，我家大门挂上了“光荣军属”牌子。1950年临近春节的一天，一队人敲锣打鼓拉着板车来到龙山巷，后来，这队伍竟然停在我家门口，敲锣打鼓的人仍然可劲地敲敲打打，两个干部模样的女同志，一个从板车上拿了猪肉和年糕，一个手里拿着两朵大红花走进我家，一些乡邻也跟进来看热闹。人群把我爸妈围在中间，爸妈都给戴上了大红花，一位女干部说了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话，后来他们还请我爸妈说几句，爸妈脸涨得通红，只会憨憨地笑——这是我亲眼见到的“拥军优属”活动，大约连续办了三四年。

1950年，父亲陆续卖掉三个西装店，开了一家当铺——钦龙当铺（老福州可能还记得这店名），当铺生意不错，口碑很好，但不合时宜，到1953年便关门大吉。这期间，我爸还得过“抗美援朝三等功”的奖状，我问二哥，爸是怎么立的功？二哥说，大约是捐钱捐物吧。

海峡两岸，父子连心

接着的事情，是我的三个哥哥相继参加了革命工作，两个姐姐也工作嫁人，只有五哥与我在念书，父亲的家庭负担轻多了，只是常想念我大哥，我常听他念叨：“依水到底怎么样了？”“依水这人到底还在不在？都七八年了，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。”妈听到这些话，就抹眼泪。

大哥的消息，是到1994年才来的。那年，妈突然接到大哥从台湾寄来的信函和一张全家福照片（下图）。而日夜盼儿归的父亲，已于1976年抱憾离世。

原来，1948年，大哥参加了国民党海军，以后还当了团长。1954年，大哥被派去驻守大陈岛，有一阵子，大哥整天心神不宁，特别想家，耳边老听见爸妈在喊他，叫他回家——就是父亲特别念叨他的那段时间！父子之间，原来真有心灵感应啊。

1955年，解放军攻下一江山岛，炮火可覆盖大陈岛，大陈岛无论如何都守不住了。这时，大哥他们接到撤退的命令，才免除了当炮灰的命运。而这时，二姐在军区医院，二姐夫是省军区后勤部战备处处长，直接、间接地地为解放大陈岛工作。

我的大哥大嫂回来啦

由于是公职人员，大哥要退休后才能探亲，大哥于一九九七年初回福州。那天，我们都去义序机场接大哥大嫂，大哥老远就认出白发苍苍的老妈妈，喊一声：“依妈——”，小跑着上前紧紧地拉着妈的手，说：“依水回来啦。”妈似梦似醒，问：“依水回来啦？”连续问了三遍，然后，母子俩都哭了，然后又都笑了。我在一旁及时地按下快门。大哥大嫂一人一边搀着妈妈步出机场，妈笑得那么开心幸福！有趣的是，大哥旁边是二姐夫，大嫂旁边是二姐，这两个共产党员与两个国民党员谈得很热烈、很融洽——本来就是一家人嘛。

那次，大哥、大嫂在家住了近一个月，走亲访友，重游旧地。以后每隔一年，大哥便回榕一次。2003年，大嫂来信说，大哥重病。就在这年年底，95岁的妈妈突发重病，一周后逝世。次年，78岁的大哥因肺癌医治无效，在台北逝世。

大嫂在2008年与2012年又回榕两次，今年，还打算着要带我侄儿侄女回来认祖归宗。前几年，祖屋拆迁时，大嫂坚决不要应得的一份拆迁款。那是不小的数目，但任凭我们怎么劝说，大嫂却心意坚决。她说，大哥生前交代过，他的那份，要平分给众兄弟，她不能违背大哥的遗言。